

忽必烈幕府用人导向与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

任红敏

内容提要： 忽必烈幕府多用经济之士和义理之士而辞章之士受到排斥，其用人导向影响了入仕文人的的人生价值取向。元代文人雅俗分流，雅文学作者群体和投身于杂剧创作的俗文学作家队伍形成，且具有相当规模。雅俗分流，使得元代文坛呈现出独特的格局与风貌。

关键词： 忽必烈幕府 用人导向 元代作家 雅俗分流

忽必烈幕府文人虽人数众多、民族与地域来源广泛，大多为旧金士大夫和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名士，代表了由金入元文士的精英，但单纯以文学之士身份入侍藩府的很少。从忽必烈藩府的用人导向来看，是以经济和义理之士为主。

—

根据来源地和学术渊源的不同，藩府文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怀卫理学家群，邢州学派，由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延纳的文士及其余金源文士，藩府侍从中的文士，包括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和有着一定汉文化修养的非汉族侍卫。

其一，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和智迁等人都是理学家，并非单纯的文学之士，代表人物许衡、姚枢等人，讲学于怀庆、卫辉一带，故称为怀卫理学家群。姚枢、窦默、许衡等人，乃北方第一批理学家，尤其是许衡，更为一代宗师。他们在元初北方传播理学，著书育人，使文明一脉，得以发扬光大，对元初北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贡献很大，使元代学术由湮晦渐复昌明，而许衡等人得到忽必烈的信任，能够在元初政治舞台上发挥巨大作用，主要源于怀卫理学家的学术特点：他们拒绝南宋理学的空疏，在北方学术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接受南方朱学；重日用，重治生；不重心性义理的探讨而特别重视学术的普及与实用，志在救世行道，以拯救生民为己任。

其二，以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刘秉恕、赵秉温等人为代表的邢州学派。邢州学派以刘秉忠为首。刘秉忠是以僧人身份较早进入忽必烈潜邸的文人，是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

之一,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继位之前,由他推荐了一批以邢州籍为主的幕府侍臣,大多是他的同学、学生。邢州学派均不是以文学之士身份入侍忽必烈幕府的,他们为学驳杂,而不是纯粹的儒学。如刘秉忠,学兼儒、释、道三家,“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①。张文谦也是洞研术数。邢州学派不是空谈性理的儒生,对元初百业待兴匡救时弊、拨乱反正的局面,大多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因而无不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其三,由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延纳的文人以及其余金源文士。金元之际,兵荒马乱,社会混乱,汉人世侯控制区内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战争的破坏较小,为了培植势力与声望,一些有识见的世侯多重视文教,也注意网罗人才,文人纷纷投靠大小世侯,因之而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体。忽必烈从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招揽了一些文士进入其金莲川藩府。从东平严氏收揽的文士有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等,从真定史氏招纳的张德辉、贾居贞、张璠、周惠等,从顺天张柔延揽的有名儒王鹗。此外,还有赵璧、李简、张耕、杨惟中、宋衍、杨果、马亨、李克忠、杜思敬、周定甫、陈思济、王博文、寇元德、王利用、李德辉等其他金源文士。他们多以治政之才被忽必烈看中而进入藩府,如赵璧、李简、张耕、陈纪、杨果、杨惟中、宋衍、杨奂、马亨、李克忠、贾居贞等人。虽有一些是以文学著称于世,如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杨果、王鹗等人,均以文学才华闻名于世,但他们并非以辞章之士的身份入侍忽必烈潜邸。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等,由东平严氏入藩,忽必烈看重的是他们在东平幕府所施展的政治才华。比如宋子贞,在东平严实幕府,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为严实父子出力献策,在维护军纪、建设地方官制,均科赋税等各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蒙古军队攻占汴京,当时“饥民北徙,饿殍盈道”,宋子贞协助严实,“多方赈救,全活者万余人”^②,把金朝流寓的文士收容起来,一时之间,士人云集东平。严实过世后,其子严忠济袭职,宋子贞又倡庙学,学孔孟,延请王磐为教官,教授学生几百人^③,齐鲁儒风,为之一变。商挺在东平严氏幕府,“赞忠济大兴学校”,“东州多士,公实作之”,^④延引文士,协赞严忠济大兴学校,有功於东平教育。忽必烈在潜邸,受京兆分地,“闻公有经济略,左官诸侯”^⑤,遣使征至幕府。刘肃被忽必烈招入幕府也正因其“东平二十年,赞画为多”^⑥。

① 刘秉忠:《藏春集》卷六“附录”,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

② 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〇,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③ 《内翰王文忠公》“会东平总管严公兴学养士,虚席迎致……受业者常数百人,后多为名士。”参见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姚景安点校。

④ 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一,姚景安点校。

⑤ 同上。

⑥ 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〇,姚景安点校。

以上由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中进入忽必烈藩府的文人,在忽必烈藩府中人数最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促进元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修复孔庙、尊孔,设置编集经史机构等各个方面,均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忽必烈藩府侍从中的文士。大致可分两类,一是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赵炳、高良弼、许国祯、许昞、谭澄、柴桢、姚天福、赵弼、崔斌等人,二是深受儒学影响有着很高的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卫谋臣,包括蒙古侍从文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以及西域色目文人侍从孟速思、廉希宪,女真人赵良弼等人。他们大多业有专精,或精于吏事,或善于医药,或以勋阀之子的身份,或因特殊机遇而入侍藩府,被忽必烈留任侍卫。这些人都是藩府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而且多是经济之才,具有实际的行政工作能力,有治国的见识和眼界,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绝非辞章之士。虽然有些人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比如女真人赵良弼,初举进士,又“明敏,多智略”^①,是至元前期出使日本、高丽等国有名的使臣,对域外情况了解颇多,写下了《日本纪行诗》多首,有《樊川集》,但赵良弼从不以能诗善文知名。

从以上进入忽必烈幕府文士的具体情况来看,忽必烈幕府多用经济 and 义理之士,辞章之士受到排斥。在忽必烈幕府文士的努力下,蒙古政权按照中原王朝的政体和运作模式,建成了继唐、宋之后一代正统王朝“大元”。这些藩府文人也成为在蒙元政权之中独享政治权利与社会荣耀的政治精英,构成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与文化力量,他们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和北方文坛,影响着一个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也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进而影响了有元一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再者,藩府文人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开创山河一统的强大帝国,实现四海混一的卓越功绩,刺激并影响着广大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始终是中国文人不渝的追求,他们也希望如忽必烈儒臣一样被君主擢拔使用,理直气壮地“在其位,谋其政”,实现其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因而,这也影响了元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以义理之士和经济之士为重,不愿以辞章之士自居。

二

忽必烈幕府时期的用人导向促使形成了“中统儒治”之时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倾向,并且对元代的科举考试影响也很大。

幕府文人主体上是反对行科举的,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虽多次有臣子上奏要求科举取士,忽必烈也多次下诏定制开科取士,但迟迟未能实施科举考试。蒙哥汗初年,刘秉忠就曾向

^① 宋濂主编《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43页。

忽必烈上书：“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①，反对以辞赋取士。至元八年（1271），徒单公履本欲建言行科举，反而引起了经义之学与词章之学有用无用之争：

八年，侍读徒单公履欲行贡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上怒，已召先少师文献公、司徒许文正公与一左相廷辩。公（按即董文忠）自外入，上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乌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求售己能，欲徇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事为之止。君子以为善于羽翼斯文。^②

不仅幕府文人许衡不赞成科举，幕府侍卫谋臣董文忠也不赞成科举，而董文忠关于学术的取向，是尚实、尚用，这无疑代表了忽必烈幕府君臣的普遍看法。元世祖忽必烈注重的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他不满士子赋诗赋空文，所以说：“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③由忽必烈君臣对科举取士经义之学与词章之学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诗赋不过是声律对偶、摘章绘句之学，不仅于经邦济世无补，反而会导致士习浮华。

藩府文人无论在忽必烈潜邸做幕僚，及以后为朝臣，或居台谏、或在经筵、或处翰苑，多处于政治的核心，自然他们的态度和看法会直接影响帝王的观念以及朝廷的政策。十二年（1275）春徒单公履再次“请设取士之科”，诏命儒臣“杂议”，杨恭懿也是援引“从事实学”这种观点来反对以诗赋取士，主张“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④

元代科举至仁宗时才恢复。忽必烈时期幕府文人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对仁宗时科举的影响是巨大的。皇庆二年讨论恢复科举时，又以“人都学习的浮华了”为由，“罢去词赋的言语”。^⑤据《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科目》载：“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⑥

① 宋濂主编《元史》，第 3690 页。

② 《姚燧集》，查洪德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30 页。

③ 同上。

④ 《姚燧集》，查洪德点校，第 279 页。

⑤ 《元典章》卷三一，北京：中国书店，1990 年。

⑥ 宋濂主编《元史》，第 2018 页。

程钜夫所拟《科举诏》中“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①的方针,即由忽必烈“中统儒治”所形成的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倾向而来。在如此明确的导向下,元代的辞章之士始终是受排斥的。

有人评论说:“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②,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自金宋亡后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迟迟未能恢复科举,导致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断裂,士子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用人取才最重世家,即当时所谓‘根脚’。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可说是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此一主要的人仕管道。”^③因此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社会运行轨迹一下子变了,元代士人们通向显达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被堵塞了,“两宋以来独享统治权力与社会荣耀的‘知识菁英’遂多被摒斥于统治阶层以外”^④。这就从根本上打碎了元代文人功业的幻梦。在元代,即便是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在忽必烈“中统儒治”所形成的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倾向的用人导向下,元代的辞章之士,始终是受排斥的。至于辞章之士,斥而不用,失去了科举进身之阶,被断送了上进之路。

人生不一定要治国平天下才有价值,虽然他们被抛出了社会的主流,远离统治权利,社会地位已然是大大跌落了,没有富与贵,他们还有“文”,“文”就是文人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只不过他们淡化了与政治的依附关系,这部分儒生文人,他们在动乱扰攘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全节远害归隐,或隐居教授,或隐于田园,或隐于山林,或隐于释老,亦或隐于市井,他们依然追求的是文人生活雅趣之乐,追求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独立。至于经济和义理之士,他们还有机会出任新朝,对此还抱有信心,于是立即投入到“救世行道”的行动中,其济世救民、匡扶天下、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就能实现。在元代,钟嗣成在他的《录鬼簿》中就已把文人分为了三类:“若以读万卷书,作三场文,占奎甲第者,世不乏人。其或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也。”^⑤科举入仕者,隐居岩壑者,这两类都属传统的文士,第三类“以文章为戏玩者”,他们是那部分具有文学素养的下层文士,绝大部分终身布衣,自称“浪子”,即所谓的“浪子”文人群体,是新分离出来的一个群体。当然,除“浪子”文人群体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从雅文化群体分离出来的下层士人,可称之为江湖游士群。因元前期

①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② 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③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④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187页。

⑤ 钟嗣成、贾仲明撰《录鬼簿新校注》,马廉校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46页。

不设科举,仕途逼仄,再加上“士失其守,反不如农工商贾之定业”^①,为了谋生,一部分士人转向术士或相士,成为以相术谋生的江湖游士,即所谓江湖术士,即“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阊台郡县,糊口耳”^②。这部分文人在元代人数较多,据刘克庄《术者施元龙行卷》载:“挟术浪走四方者如麻粟”^③。另有一部分因“不务举子业”,为了生计而“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辄数千缗、以至万缗。”^④是以诗文谋生的江湖诗人。从戴复古《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中:“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平生知己管夷吾,得为万贡堂前客。嘲吟有罪遭天厄,谋归未办资身策。鸡林莫有买诗人,明日烦公问蕃舶。”^⑤可以看到元代下层士人向豪门兜售自己诗文的情形,这也是当时江湖士人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两部分就是从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江湖游士群,他们游谒于江湖以生存。

元初北方那些从文人雅士中分离出来向下流动而走入市井的才子文人,他们与歌伎艺人交往,进入以市民为主体的商业化文化娱乐市场,投身于为正统文人所不看重的新兴文体——杂剧和散曲的创作,至此,俗文学作家队伍形成,且具有相当规模。元散曲家赵显宏【南吕·一枝花】《行乐》写到:“十年将黄卷习,半世把红妆贖。向莺花场上走,将风月担儿拈。”^⑥十年苦读诗书,半世以来肩负的却是“风月担”,行走于“莺花场”,在舞妓歌姬风月场中消遣,诗酒忘忧。他们在市井这个文化空间,不受礼法与礼教在思想上的管辖与束缚,摆脱男女之大防,创造了俗文学的辉煌,扎拉嘎说:“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⑦。

宋代的俗文学以小说为结构主体,元代的俗文学则以戏剧为主,明代的俗文学是以小说和戏曲为结构主体,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阐明了这一点:“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皆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侯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⑧元杂剧的创作相当兴盛,以《全元戏曲》收录为据,则“元代南戏、杂剧两种类型的作品,合达二百种以上”^⑨,其成就虽然不能和明清小说抗衡,但在俗文学发展史中,在小说戏曲发展历程中,为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石。元代戏曲作家

① 陆文圭:《吴县学田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

② 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二〇,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40页。

③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13页。

④ 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卷二〇,李庆甲集评校点,第840页。

⑤ 戴复古:《戴复古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⑥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7页。

⑦ 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⑧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150页。

⑨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也是一个阵容不算小的读书人群体,翻开《录鬼簿》,我们看到的一群沉沦下僚、跻身勾栏瓦舍的“浪子”文人,即元杂剧作家群,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①就有 56 人。元代戏曲作家的人数其实难以确计,但以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②的考订来看,其中有名有姓的至少也有百人,这还不计入那些无名和失载作家。由此,元代作家队伍而分雅分俗。

三

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元代雅文学作家队伍,南北的诗文作家包括科举入仕者和隐居岩壑者,都属雅文学阵营,侧重的依然是作为制度文化载体的传统诗文。诗文依然是元代文学的大宗,当时,人们看重的依然是文章和诗。元代的诗文别集数量相当可观,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入元人别集 171 种,另存目 36 种,而现存元人诗文集起码在 450 种以上,散佚(含未见)425 种。元代诗文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高。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称:“我朝廷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③在他看来,元代是文章盛世。据现有文献可知,元代诗人有五千多,而曲家只有二百多人。可知,元代雅俗文学的分流,仍是以雅文学为主体。

元代朝廷的用人取向和辞章之士受排斥的现实,不仅影响了统治者对雅文化雅文学的态度,也影响了入仕文人(亦或称为雅文学作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元之前,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正统文人往往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训,大都从事诗文创作,而历代帝王不管是为了宣扬教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也大多参与了诗文的倡导和创作活动。元代的统治者显然不理解也不欣赏汉族所谓传统的高雅文化,而更注重实用,忽必烈就曾对藩府儒臣赵良弼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④帝王的偏好影响也是很大的,因而,元代文人对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以温柔敦厚、载道劝善为创作主旨的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社会主流文学,以“阳春白雪”自诩的雅文化雅文学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如藩府理学家许衡诗文雅洁深稳而质实,代表了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文章无意修词,而自然明白醇正。诸体诗亦具有风格,尤讲学家所难得也”^⑤。不过,许衡一生所致力,并非是文章家的文字辞章之工,也不是理学家的天理性命之奥,他关注的

① 钟嗣成、贾仲明撰《录鬼簿新校注》,马廉校注,第 9 页。

②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③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4 册,第 445 页。

④ 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746 页。

⑤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影印本。

是基本精神重“践履”的经世致用,将儒学或说理之学应用于政治实践。正如明人何瑭《表彰文正公碑记》所说:“学以躬行为急,而不徒事乎语言文字之间;道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其所得者,盖纯乎正而不可加矣。”^①他并不“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而着意于“修齐治平之方,义利取舍之分”。^②许衡认为文士不能治国,对此,他有如下说辞:“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后世以智术文才之士君国子民,此等人岂可在君长之位?纵文章如苏、黄,也服不得不识字人。有德则万人皆服,是万人共尊者。非一艺一能服其同类者也。”^③

按许衡的说法,文为德之累,文名为身之累,文高必然德下,文高只能位下。许衡作为元初北方的大儒,曾任中书左丞,出任国子监祭酒。在国子监,许衡教授了一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其中不乏俊杰之士,有王梓、刘季伟、韩思永、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等汉族子弟,还有耶律楚材之孙,契丹族的耶律有尚,以及燕真、坚童、秃忽鲁、也先铁木儿、不忽木、巉巉等蒙古、色目学生。因而,他对元代文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他的学生姚燧,是元代的文章大家。姚燧早年作文章受人赞赏,许衡立即告诫他:“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钩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不希望他以文名世,还断言“能文之士必蔽”。^④

元代的人仕文人都以经济之才或义理之学相标榜,虽然也从事文学创作,但“以余力为诗文”^⑤。如刘秉忠诗文创作是“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⑥,虽然也希望别人赞赏或推崇自己的诗文,但决不愿意被视为诗人或文章家,忌讳被视为辞章之士。宋濂,作为元末代表性的文章家,亦是志在经济和义理,在他所撰自传体《白牛生传》说:“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赧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⑦不喜欢被人以文学之士看待。

因而元代文章家和道学家合二为一,不再区分学者和文人,元中期虞集等馆阁文臣即是

① 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四,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

② 同上。

③ 许衡:《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④ 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 这种说法见于《吴文正集》卷二十三《丁叔才诗序》:“唐宋以来之为诗,出没变化以为新,雕镂绘画以为工,牛鬼神蛇以为奇,而《周南·樛木》等篇何新之有?何工之有?何奇之有?临川丁叔才教授生徒,以其余力为诗章。辞达而已。不惟新、惟工、惟奇之尚。”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第382页。

⑥ 阎复:《藏春集序》,参见刘秉忠《藏春集》卷六“附录”。

⑦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持这种看法,认为“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而“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①应该消弭经学与文艺的壁垒,二者融合。宋濂等修撰的《元史》将前代史书的儒林、文苑二传合而一之为《儒学传》:“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颀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经,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为二也明矣。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②

忽必烈儒臣论学论文也是尚实尚用。如许衡学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践履”,即实践性,他所关注的就是经世致用,他认为:“学以躬行为急,而不徒事乎语言文字之间;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③藩府儒臣郝经也非常重视文章之“实用”,他在《文弊解》中说:“事虚文而弃实用,弊已久矣。”郝经特别强调文章的“质”与“实”,他明确提出:“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认为诗文应当有实际的内容,针对当时文坛存在的“事虚文而弃实用”现象提出批评,坚决反对工巧而无用之文:“文章工矣,功利急矣,义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无用也。嗟乎!不耕不凿,不蚕缲而衣食者,谓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义而文章者,谓之逐末之士。”^④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不尚空谈,提倡经世致用之文。

忽必烈幕府时期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导向不仅影响了有元一代的科举制度,影响了入仕文人的的人生价值取向,使道家家和文章家合二而一,不再区分学者与文人,也形成了元代论学论文尚实尚用的倾向,促进了元代文士的分化,或归雅或趋俗。这种雅俗分流的独特现象,使得元代文坛呈现出独特的格局与风貌,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明、清两代雅俗分流格局的形成及其日趋明显,雅、俗文学共同繁荣新局面的出现,进而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2BZW036)的阶段性成果。

(任红敏,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刚】

① 宋濂主编《元史》,第537页。

② 宋濂主编《元史》,第4313页。

③ 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四。

④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四《上紫阳先生论学书》,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1507)刻本。